

出版说明

1.《大学演讲录》丛书试图为读者展现一个开放的、多元的、互动的阅读空间，除关注既有学术品味又有现实意义的演讲外，以后还将尝试适量刊发精彩的思想论文、学人访谈，还将针对大家感兴趣的话题邀请各类学者对我们所处的时代进行发言。我们希望各位学者的思想和观点能通过本丛书对社会产生某种程度的影响，或是进入读者诸君的日常生活，并因此创造更多的（向上的、积极的、思考的、探寻的）可能性。

2. 本书的每篇文章皆经由原作者授权（请尊重作者知识产权，转载请经得许可），每篇文章都是负责任的、经得住考验的。为了让读者有身临其境的现场感，文章多保留了（忠实于录音的）口语化形式，欢迎读者朋友就文中内容及形式提出建议和批评。

3. 为及时将最新的研究成果和思想动态提供给读者，本丛书将完全根据现实需要确定出版周期。限于人力，有许多精彩的演讲我们无力获得，欢迎各界朋友为我们提供这方面的资源和信息，您的付出必将得到回报。我们的联系方式是 北京 86—160 信箱 邮编：100086 Email: asnl@263.net.cn（文池收）向每一位为本书出版付出劳动的老师和朋友致敬，向每位关注我们的读者致敬！

卷首语

大学在中国诞生这段不太长的历史里，始终扮演着社会先锋的角色，她荟萃了各个时期最为优秀的学者，集中了每个年代最为新锐的青年。当睿智的学者和热诚的青年走到一起的时候，相互碰撞出了时代精神最为耀眼的火花。这些思想的精华，给社会以滋养、给民众以引导，引领我们不断开拓进取。大学里内容丰繁、风格各异的讲座正是这些思想精髓的集中展现。

在当前，学术讲座已是现代大学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它不仅仅是提供给学生一个课堂以外的学习机会，它更是学者名家们展示创新思想的平台，是学者与青年相互沟通、相互了解的渠道，也是一个学校学术水平的风向标。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名校名家的讲座能给予你最直接、最深刻、最强有力的心灵震撼。

我们秉承着沟通学术与民众的初衷，广泛收集了名校、名家各类讲座，经过严格审慎的筛选，把它们结集成书，送给那些对生活充满热情与信心的读者，希望能对读者有所裨益。

目 录

- 樊 纲 全球化与新经济 / 1
- 姚 洋 中国经济转型中的社会公正 / 33
- 侯若石 中国加入 WTO 之后的 WTO / 51
- 王国刚 中国金融市场难点分析 / 61
- 阮次山 中美关系——合作与冲突 / 87
- 许世铨 台湾问题及其走势 / 100
- 张文木 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国家利益 / 121
- 朱立群 从阿富汗战争看美欧关系 / 148
- 何兆武 中西文化与全球化 / 167
- 靳希平 作为精神消遣的西方哲学 / 183
- 廖申白 西方思想中的“正义”观念 / 202
- 梁志学 文明必将战胜野蛮
——费希特历史哲学评述 / 214
- 陈其泰 传统文化的现代审视
——儒学与史学的双向思考 / 222
- 毕淑敏 你是否需要预知今生的苦难 / 234
- 杨雄里 认识自然、认识自身——脑研究的启示 / 242

樊纲 经济学博士，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兼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教授；1969年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务农，1975年转到河北省围场县；1978年考入河北大学经济系（七七级）政治经济学专业，1982年毕业后，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系，主攻“西方经济学”专业；1985年至1987年赴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及哈佛大学访问研究；1988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同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1992至1993年任《经济研究》编辑部主任，1994-1995年任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主要著作《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主笔）、《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市场机制与经济效率》、《渐进之路——对经济改革的经济学思考》、《中国渐进改革的政治经济学》等学术专著和《经济文论》、《樊纲集》、《走进风险的世界》、《发展的道理》等论文集，在《经济研究》等中国学术刊物上发表了《灰市场理论》、《论改革过程》等学术论文近百篇，在理论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1991年获孙冶方经济学优秀论文奖。1992年被破格晋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3年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界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之一。近年来的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暨“过渡经济学”。

演讲时间 2001年6月

地点 北京师范大学

全球化与新经济

大家都是学经济的研究生和本科生，那么今天谈两个比较热门的经济问题：全球化、新经济。大家可能更关心一些改革的问题以及中国的一些其他发展问题，因为平常讲得比较多，讲得也有点儿腻了。咱们还是讲一些从理论上和现实中可以共同来分析的、平常不太从理论上分析的一些问题。谈一谈对全球化、新经济怎么从理论上分析，然后大家可以讨论讨论这方面的问题，也可以提一些其他方面的问题。

一、全球化

先讲全球化问题，包括全球化和中国的关系，中国在全球化中的位置。

全球化不是一个新的概念,其实是一个老概念。无论货物也好、各种生产要素也好,它们在全球的流动、在全球范围内的组合,都是一种全球化的过程。过去在殖民地时代就有人提这些概念,如市场向全球的扩大、国际化等,都是这种概念。那么这次全球化的概念又变得这样时髦,全球化变成一个势不可挡的趋势,它的新的特点在什么地方?应该说有两方面特点。

第一,这次主要的特点是生产要素在全球的重新配置,生产要素在全球配置速度、流动速度的加快。特别是资本和技术在全球进行重新配置。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在全球配置资源,在全球寻找利润最大的生产基地,在全球组合它的资源,寻找各个部件、配件在哪里生产最好,然后到一个成本最低、利润最高的地方去进行组合,整个生产过程全球化。商业决策中心、研发中心可以在总部,各种零部件分布在全球各国采购,而产品的设计、软件的设计等可以承包给外面来做,组装线又在另一个最便宜的地方。这次最突出的是这个特点。相关的就是技术的转移、转让。技术本身也在流动,它不是为一个跨国公司、一个国家所封闭起来的,而是在全球进行利用。在实际生产要素全球配置的背后是金融要素、金融资源在全球的配置,这就是金融市场的全球化,因此现在全球形成了一个生产网络、采购网络,以及金融网络。这是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技术创新也成为一个全球的网络。过去技术创新往往是一个国家、一个地方、一个公司的事情。大家知道,技术创新分成好几个阶段:研发、试用、利用、推广、商业化应用阶段。技术创新不光是一个新技术本身的出现,它是与整个市场相联系的,有多少人去应用、去 copy、购买这个专利,去作为 follower、模仿者、利用者,这都是这个网络中的内容,都是整个技术创新过程的组成部分。这方面有专门研究技术创新的经济学理论。这个过程也在全球化。比如软件,它的设计思想可能来自于发达国家的某个大学,然后可能由一个公司进行进一步开发,它可能发包到以色列去,发包到爱尔兰、印度去。中国现在接了多少软件订单?不是没有,但中国国内参与这个方面现在还比较少。印度最多,现在号称软件大国,一年大概有 50 亿美元的出口额。印度政府“马后炮”成立了一个软件部号称要进行管理,但软件行业有人说:“我们发展起来就是因为没有政府管理”。总之是可以发包到全世界去进行开发,然后开始在世界各地加以应

用。现在我们用的手机、电脑在全球的推广速度很快，马上加以利用，商业价值就开始实现。这样，技术创新也形成了一个世界范围的网络。

总之这次全球化进程又是跟技术进步搅在一起的。是技术进步推动全球化，全球化又推动技术进步。现在从全球经济角度来讲，最重要的两个趋势，一个是全球化，一个是技术进步。今天因为不讲国际市场的变化，还有一大趋势往往是被忽略的，就是全球经济市场化。即全球经济都在从过去多多少少的社会主义（无论是苏联的计划经济还是北欧式的社会福利国家）向更多的市场经济转轨，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大因素，所以我一直说现在世界上有三大趋势。全球化本身和技术进步结合起来又意味着全球技术创新体系的全球化，全球科技创新网络的形成。这是讲全球化要讲的第一点。

全球化很好，是人类的进步。技术进步是人类的进步，全球化应该说也是人类的进步。与全球化相关的经济体制逐步形成，应该说也是人类进步。第二点，新的全球化也引起了新的问题。现在它已经引起了很大争议，在国际上开始出现冲突，在我们国内也有很大争议。今天我想着重围绕这些争议的问题来讨论。

全球的冲突，什么冲突呢？西雅图、华盛顿、布拉格、墨尔本、达沃斯，这些召开国际组织会议的地方，国际财团、国际银行家、金融家、跨国公司总裁开会的地方，工会组织、民间团体就到这些地方去抗议、示威、冲突。美国西雅图那次就号称是20世纪60年代反越战以来最大的街头示威、街头冲突。2001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就开了一个世界社会论坛，就是要讨论全球化带来的新的不平等问题。讲到这个问题，第一，不平等是人类迄今为止还没有解决的问题，是一个永恒的问题。人类这几百年来一方面在发展、进步，一方面不断在探索解决不平问题的途径。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西方的福利社会等各种方式都在试图解决这一问题。现在又有了“第三条道路”等等。第二点，最重要的一点，在于新的技术和新的体制一方面可能提高了效率，一方面可能也带来了新的不平等，无论是技术的发明还是制度的发明。全球化可以理解为新制度的发明，技术革命可以理解为新技术的发明。人类就是这样不断创造着新的东西，而每一个新的创造都可能带来新的不平等。这次，全球化也一样，这就需要分析了。

怎么分析这个问题？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其实回到了市场竞争为什么带来不平等、为什么自愿的交易会产生不平等？回到这个最古老的问题。现在中国讨论不平等正是越来越深入开展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回到了经济学一个最基本的原理，一个经常被大家忽视的基本原理：交易。第一，使双方总的福利扩大，这一点没有问题。既然是自愿交易，我们回到经济学最基本的原理，大家自然追求效用最大化，交易双方如果是自愿的话，那么交易就一定是利益所趋，这就是理性行为假定。一定是我做这个交易比我不做这个交易要好，因此双方都获益，利益都有所增加，总的福利也就有所增长。第二点，这一点往往被人忽视，即交易双方都从中获益，但获益的大小可能是不等的，就是说在没有交易之前有一个没有被获得的“消费者剩余”。假定它是一个可以用价值衡量的量，这个消费者剩余的总量在双方的分配可能是不平等的。这是经常被人们忽视的一个经济学原理。为什么不平等？因为交易双方所处的交易地位和所面临的各种问题是不一样的。交易双方可能因为受到了各种制度、技术、自然条件、社会意识形态等等的约束而在同样的交易过程中获得的好处不一样。信息的不对称、不平等也是其中的因素。因此，交易确实总能使大家获益，但是交易不可避免往往会因交易双方所处地位的差异而导致不平等、扩大不平等。这个“利益分配区间”中的分配比例是具有不确定性的，它往往取决于双方的 bargaining power，讨价还价的能力，取决于双方在经济过程中所处的地位，各自的制度、环境、信息等等不同，在这个过程中就会出现差异。绝对地说，可能人人都在变好，从绝对量来讲，在理论上人人都长了一点，但相对地来讲，差距可能扩大，有的人相对更多，有的人相对更少，而且可能有钱的人更有钱，穷的人相对更穷。越穷的相对获得好处的能力就差一点。这就是关于市场经济、自愿交易的基本原理。再用一句经济理论的术语来说就是“帕累托最优点的位置取决于禀赋分配点的位置”。

我们假定一切全球化的要素流动都是自愿的，我接不接受你流动到我这儿来，我流不流动到你那儿去，都假定是双方的交易过程，都是一个契约，都是自愿交易。这样我们就可以假定全球化是能使每个人在绝对量上都是可以多多少少获益的。在自愿交易中双方可能是不平等的，用一个英文词儿，叫做 unequal footing，所处的地位是

不等的,所以我们无法假定大家获益的程度也是一样的。相反,根据概率的原理(最初的不平等是经常性的事实),我们却可以假定交易的结果可能恰恰使双方获益的程度不等(虽然“不等”的情况也是多样的,可能是正的,也可能是反的)。这是基本原理。

现在回到全球化这个具体问题。道理在什么地方呢?刚才讲了这次全球化的特点是生产要素的全球性再配置和流动速度的加快,我们就要分析分析在这个流动过程中谁受益更多,谁受益更少。这首先要分析,什么要素是可流动的,什么要素是不可流动的,从逻辑上来一层一层地推。资本是可流动的,技术是可流动的,土地、自然资源、自然条件是不可流动的。澳大利亚、美国有那么多农田,中国就没有,欧洲那么好的气候,中国就没有。昨天我在计委给青年干部讲评论文,其中讲到农业问题,有人提问,中国7%的土地养活20%的人口,什么时候中国才能和发达国家一样,人均农业劳动力占有耕地趋同、相等?也就是说,什么时候能够和日本、韩国、台湾一样?现在是一亩三分地,将来什么时候能够达到10公顷,也可以用现代化规模耕作,利润可以提高?有人说得1万年,我说1万年倒不至于,当然我理解这个一万年的意思。(笑声)现在我们每年最好的情况可能创造1000万个非农产业的就业岗位,那么这么算下来,算上人口,再加上人口的增长、劳动力的增长,我说大概从农业中要转移出5亿劳动力,现在就有3.5亿到4亿劳动力是纯农业劳动力,不是做工、副业的个体户,不是农村乡镇企业职工。到那个时候再加1亿多,今后每年要按1000万算的话(后面可能会加速,因为城市化等等),这需要多长时间?50年。这么算的话中国的现代化需要50年的时间。

土地不可流动,自然条件也不可流动。不过现在倒是有一个可以流动了,global warming。(笑声)劳动力、高级人才是可流动的,蓝领工人、船民是要被退回来的,是不可流动的。这一点是各国现在保持疆界的一个最起码、最基本的原因。我还记得5、6年前在国外开会,一个英国的研究国际关系的资深教授讨论国际化,指着那些刚开始研究国际关系的年轻人说:“过几年就没有国际关系了,全球化了,疆界不存在了,你们以后就失业了。”振振有辞,大家说得哈哈大笑。后来我发言的时候说,这个问题咱们等会儿,作为工业的管理者、市场的管理者的国家可能不存在了,但作为两个职能的国家依然存在:一,作为地主的国家,它收地租;二,作为工会的国家。要保持这个疆

界来防止别人、主要是穷国的人来争夺劳动岗位,来分享收入,这个职能还要存在。使馆经济处不在了,签证处还得在,还得控制人口的流动。我说到这儿大家谁也不再说什么国家不存在了。发达国家的人觉得没问题,它觉得哪里都可以走,从我们的角度来讲就有问题,我们的劳动力走不掉。什么人走得掉?人才。诸位考了 TOEFL、GRE,就走了。这对落后国家叫做“脑力流失”——brain drain,吸走、流掉。北大、清华在国际上有“美国研究院预科班”的外号。据说现在全世界有统计,发展中国家每年流到发达国家的人才相当于教育投入 180 亿美元,发达国家占了发展中国家教育经费 180 亿美元的便宜。

在这种情况下,谁有更多的流动要素,谁就可能占更大的便宜、获益就更大。那么就要看谁有流动性的资源。不难发现,是发达国家拥有更多的可流动资源、资本和技术。95% 的新专利都是发达国家发明的,资本也如此。“发达国家”的定义就是资本雄厚,就是财富。落后国家呢,不过是有刚才提到的 brain drain,发展中国家要么有点资源,要么有点劳动力,而劳动力不可流动,高级劳动力的流动又产生了一些负效果,至少在最初阶段如此。还有一条,体制。制度、体制,包括整个社会的法制,就是发展市场经济所需要的这些体制,不是不可流动,但流动速度非常慢。什么含义?就是发展中国家要想赶上来,要想在这方面获得优势的话,它的体制改革是要一定时间的,因为制度的建设是一个长过程,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中国在国际上已经改得够快的了,我们还每天着急,这个怎么说了那么多年还不改啊?国有企业怎么说了这么多年还是这样啊?(笑声)政府怎么还是有腐败?体制的变化是非常慢的,而体制影响到你能不能受益、你的成本能不能低、你能不能竞争过人家。我们一个投资决策要批来审去的弄上一年,人家当时就做了,当时就获益了。他的技术更多,他的附加值就更多,他就更能获益。他的资本更大,他就在收益分配中占主导地位。市场体制越健全,效率就越高。这就是差异所在。

因此,基本的一个判断,基本的一个逻辑,就是全球化这个过程确实导致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导致在国家之间差距拉大的问题。有一个特殊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可能对某些国家来讲差距还在缩小,但是缩小的进程放慢也是差距拉大的一个表现。中国现在处于高增长阶段,这是世界公认的。发展的过程就是缩小差距的过程,就是追赶、就是赶超。赶超不是总规模的赶超,而是人均 GDP 能追上

去。这在经济学中就叫做“趋同”。只有你的增长速度比发达国家快才能趋同。如果你的增长速度还是7%、8%，而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加快了，是不是你追上去的时间就更长、过程就更慢？这确实是前几年的实际情况。中国如果增长8%，美国增长3%，中国追上去，人均GDP相等需要68年时间；如果中国增长7%，美国增长4%（这不是假定的，这是1999年的实际情况），那么中国追上去需要多长时间呢？需要118年。据说咱们有一个权威机构是这样分析的：假定美国经济不增长，中国经济保持8%，那么需要30年时间追上去。（笑声）这个假定没有意义。1999年第四季度，中国经济增长6.8%，还算不错的吧？美国经济增长7.1%。至少在这个季度，我们的差距是绝对拉大了，对不对？现在我们人均GDP840美元，美国31500美元，瑞士40000多美元，咱们慢慢追吧。（笑声）这就说明它在这个过程中获益更多。这讲的还是中国的情况，还是比较好的情况，还没讲其他一些发展中情况。

分析这些问题，目的是要使我们问题有一清醒的认识。无论如何不能为了鼓吹我们要加入全球化（我也在鼓吹这一点），而掩盖、忽视问题的存在，不能掩耳盗铃，不能片面。分析出这些问题也是为了使我们能在国际上、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更多地争取、追求和捍卫我们的自身利益。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全球化导致差距扩大，我们是不是就应该拒绝全球化？就不参加，就反对，就排斥全球化？我们一些对全球化所带来问题的批判，导致的结论似乎就是我们不应该参加，至少是不积极参加全球化的进程，就是继续“自力更生”。其实，全球化不是一个可能，而是一个现实，而且是一个你参加不参加都在进行的现实。全球化的问题也是一个现实，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发现全球化会产生问题，产生对发展中国家不利的一些后果，也是一个现实，而且也并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新发现”，它历来如此，从来如此。有的人把“国际组织由发达国家主宰”，全球化有利于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并不希望我们发展”等等，当做一个新的发现，并似乎能从中引出什么新的结论。其实所有这些都是历来如此，从来如此。这个世界从来就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这应该是我们一切分析、一切政策制定的一个基本前提，一个常识性的事实陈述，而有的人居然把它当成新的发现来“惊呼”！我们的任务也根本不在于抱怨别人如何的弱

肉强食,而在于想办法不当弱肉,也去强食,如此而已。其他一切都是费话。

那么我们怎么才能也去“强食”。是参加全球化,还是拒绝全球化?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从来不是去幻想有什么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只占便宜不付代价的“完美”的方案(因为天下不存在这样的方案,不存在免费的午餐),而只是研究什么是“可替代的方案”(alternatives),在都不那么完美的方案中比较和选择痛苦较小而可达到目的的方案。“参加全球化”有问题,尽管我们可以获得一些外资和技术,但会让外国人占我们的便宜。那好,它的可替代方案是“不参加”。可是不参加的结果是什么?现在国际上在全球化的边上还有一个概念,叫做“边缘化”,也就是你不参加全球化,不能获得发展,不能逐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结果就是被全球化的进程所淘汰。你要这个方案吗?

有人说,我不反对加入全球化,但不能太快。当然加入全球化也是一个过程,也要尽可能地保护我们一些弱小企业和就业人员的利益。这是为什么加入WTO要进行艰苦的谈判。但是,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技术革命日新月异,全球化迅速发展,你要多慢才能追上去?加入WTO的一个重要好处就是它能逼着我们加快改革的步伐,加快我们与世界接轨的步伐,迫使我们付出一些早晚要付出的“改革成本”以换取今后更好的发展。总的算账,这个快一点的“供选方案”,成本较小,比较合算,这是经济分析的结论。

我们应该看到我们经过过去20多年的改革开放,在国际上已经有了一定的竞争力,已经能够更多地从全球化中受益,而不仅仅是让出一块市场,全球化对我们来说已经意味着更大的发展的机会,而不仅仅是成为别人的附庸。

首先,我们毕竟已经加入了全球的生产网络和产品“采购网络”,随着中国加入WTO,随着更多的外资进入中国,随着更多的跨国公司将其生产基地转移到中国,我们越来越成为全世界的制造业中心,为全球市场生产、供货,为我们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前景,为我们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为我们今后5亿农民进城、离开土地,提供的现实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积极地加入全球化进程才是傻子。我们在担心加入WTO、加入全球化进程对我们带来的压力,世界上的许多人也在担心我们加入进去之后对他们带来的压力。在西

亚图,在热亚那,在那些街头抗议者之中有一些人是发达国家的劳工组织,他们在抗议全球化把他们的就业机会“化”到了国外去,也就是化到了发展中国家去。他们当然无法抗议我们的劳动工资低,因为那意味着我们比他们穷,于是他们就抗议我们的“劳动条件”太差,比如缝衣工没有那种几十美金一幅的金属手套戴,车间不能做到恒温。我在美国耳听过美国“劳联产联”主席的讲话,反华反到了完全不讲道理,不仅是可以不顾事实,而且是根本不需要事实。说白了就是一句话,中国人抢了他们的饭碗。这就是利益冲突。我们今后即使加入了WTO,面临的被发达国家指责为“倾销”的案子也少不了。对发展中国家,有人在说我们的机遇对他们来说构成一种“威胁”。在国际上开会,不仅东南亚,南亚、中亚的国家对我们也颇有怨言。在国际会议上有人就直接问:“你们中国是不是就想用你们的廉价物品把我们的工业搞死?”(笑声)一方面国际资本不到那儿去,一方面中国大量的廉价物品去了。他们的确面临着一定的挑战。前两天在美国开会,新加坡一个报社的总编和我谈对中国的反倾销问题。他掏出一个眼镜盒,说:“我们调查了,你们生产这个东西的成本一定高于在新加坡的售价!”我也掏出一个眼镜盒来,我说:“你那个是在新加坡买的,我这个是在中国买的。你那个多少钱?”他说:“我这个8美元。”我说:“我这个1美元。”中国的这种小眼镜10块钱一个,深圳遍地都是,全国都有。我说,咱们讨论讨论什么叫倾销。如果在国内比卖到国外贵,那么这个叫倾销,这是第一;第二,如果短期地削价出售,可能叫倾销,如果我长期好几年都是这个价格,这说明我成本盯得住,你不能说我是倾销。这个东西因为它便宜,3年当中我买了5个,办公室搁一个,床头搁一个,可以到处搁,省得老忘。3年都是这个价格,这不叫倾销,我们就是便宜。我们劳动力比泰国便宜,原来还比印尼便宜,这两年不知道印尼怎么样了。我们技术在进步,体制也在改革,还有乡镇企业的私有化等。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比其他一些国家是有了一定的优势的,所以中国现在开始在亚太地区讨论自由贸易区,这都是背景,这个背景就是中国的信心增强了。劣势国家都不讨论自由贸易区问题,开始具有优势了,就讨论了。将来中国的行为也会是这样,这是国家利益,这是第一。

第二,我们现在毕竟参加了全球的技术进步、技术创新体系,这一点也很重要。在现在新一轮的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当中离不开技

术进步的这个过程。第一 我们是新技术的直接利用者。在我们的发展过程中利用了大量的新技术 ,尽管不是我们发明的 ,但我们可以利用它 ,我们还有能力去利用它 ;第二点 ,我们是新技术的模仿者 ,我们在做 follower。技术进步有几个过程 ,一开始 innovation leader 然后是 innovation follower ,大家都 followed ,技术创新的利润就没了。我们在模仿 模仿有时被称为侵犯知识产权 ,(笑声)这也是不断在争论的事情。我们确实有违反知识产权的事情 ,但有些确实也不是。如果它用你的牌子 ,那叫违反知识产权 ,如果它做的东西像你的 ,那叫模仿。全世界都在做这些事情 ,发达国家也做这些事情 ,对不对 ?这毕竟是一个技术进步扩散的过程 ;没有这一点发展中国家还有什么发展 ,穷人就永远是穷人了。第三 ,毕竟中国还有一些技术创新能力。中国是一个大国 ,在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对教育历来还是重视的。第四 ,中国有一大批留学生在国外 ,在硅谷 ,形成了一种自然的纽带。我们虽然有脑力流失 ,但我们逐步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受了一些益 ;有些人还能回来 ,有些人在日常的相互交往中 ,通过 e-mail 相互联系的时候就 知道他们在那儿干什么。只要不把他们当成间谍 ,我们还能受点儿益 ,要把他们打成间谍 ,这个益也受不了了。(笑声)

中国或多或少在这个网络当中。只要你在这个网络当中 ,你就 有希望随着经济的发展、教育水平的提高 ,在这个网络中的地位也逐 步上升。现在我们主要是 follower ,绝不能一口吃成个胖子 ,该到哪 一步就是哪一步。现在更多地利用别人的技术没有什么坏处 ,现在 我们更需要的是降低成本来利用这些技术。诸位如果要研究发展经 济学的话这里面还有一系列的问题。因此 ,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 的前景应该还是不错的 ,所以我历来认为加入 WTO、进一步加入全球 化进程对中国长远来讲好处大于坏处。

国外现在怕中国也就怕的是这一点。中国自己的市场又这么 大 ,再加入全球化进程 ,吸引那么多外资 ,发达国家也怕 ,发展中国家 也怕 ,所以中国以后几十年在国际上日子不太好过。一方面资本流 动 ,加入国际市场越来越多 ,另一方面各种各样的纠纷、矛盾、冲突也 很多 ,所谓“新兴的 power”跟美国总是要冲突的 ,不是这样的冲突就 是那样的冲突。加上中国有一些特殊的问题 ,双方的冲突可能更大 一些。要看到这个前景 ,但不能像有些人那样 ,一看到这些东西就 讲 :“你看看 ,全球化有什么好处啊 ?”你关起门来没人理你倒好 ,但

问题是你也就不发展了，你也追不上去了。发展的问题并不是说你今天比昨天过得好一点，缩小差距才叫发展。这是研究“发展”概念最基本的一条。没有缩小差距，不叫发展，叫有所增长。发展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是发展中国家怎么在处处落后的情况下还能增长，而且增长得比人家快，因此能够缩小差距。核心是这个问题。现在发展经济学讲得比较少，其实其中很有学问，而现在跟我们相关的就是发展经济学和转型经济学、过渡经济学。

全球化的问题就讲到这儿，下面讲讲新经济。

二、新经济

新经济现在大家疑问比较多，争论也比较多，因为美国股市一直在跌，纳斯达克的泡沫崩了。

有两件发生在今天的事情。有两家与我们有关系的网站，一个是美国芝加哥的 Chinaonline，这是美国人搞的一个专门报道中国各种消息的英文网站。过去一年我们与他们交流过一些宏观经济分析，他们为此而付给我们研究所一定的咨询费。刚合作了半年他们就停止付费了，交流也就停了。今天他们又和我们联系了，e-mail 标题是“继续合作”。怎么合作呢？他们说现在他们的网站改为收费了，他们的网站以前是免费的，现在变成 fee-based website 了。大家注意这都是跟新经济发展相关的事情。他们建议新的合作方式是我们提供一些东西，他们收费，然后大家分成。我们接受不接受，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我想我们不接受，因为我们没法控制这个收费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这个网站还在调整，它还算支撑得下去的。

另一件事是刚收到一个 e-mail，有一个在香港、新加坡的大型跨国的咨询公司的网站，以前也有过一些往来，今天告诉我他们的网站关掉了，说是要集中精力、财力去做他们原来的 traditional business：会议、咨询、business conference 等等，因此将来希望更多在那些领域合作。

这就是网络业、整个所谓新经济业的现状，正在调整。我在过去两年已经就所谓“新经济”讲了许多，现在还可以来进一步分析：什么是新经济、中国怎么看待新经济、下一步新经济本身怎么发展、是不

是能够发展 等等。

第一点 新经济的概念 ,什么叫新经济。“ 新经济 ”这个词原来指的是美国经济的一种状态 ,一种高增长、低通胀的状态 ,号称打破了“ 菲利普斯曲线 ”的状态 ,找不出词儿来 ,就管它叫新经济。当然 ,还有人在后面加上一些新的内容 ,如技术进步等。后来人们用新经济的概念往往特指信息经济这一块 ,指信息产业和由信息产业带动的经济增长。然后又把新的产业进来之后整个经济状况这种新的变化、信息技术的这种状况叫做新经济。我们后来用的就是这个比较狭义上的概念。有人还想把它定义得更宽。

如果新经济指的是美国经济当时的那种高增长、低通胀的状态 ,那从这个角度来讲 ,所谓新经济就不是一般国家可以学的。《北京青年报》登了一篇文章批判我 ,说 :“ 樊纲反对新经济。我们要的新经济是新技术、全球化、高效率的市场。 ”我说这样的新经济谁都不反对 ,但问题在于你在现在能不能马上搞出一个高效率的市场。美国经济能够实现高增长、低通胀 ,我们要是也能够实现这种状况那当然好 ,但能不能实现呢 ?前两年我们也高增长、低通胀 ,我们还通货紧缩呢 ,但这是两码事 ,不可同日而语 ,不是同一体制下的问题 ,不是同类的问题。

不想在这个概念上多讲了。

现在的问题是新经济什么是新的什么是不新的。我想先不说什么是新的 ,咱们先来说说什么是不新的 ,什么是在过去几年的泡沫过程中被大家误认为是新的东西 ,因此产生了错误的判断、错误的投资 ,结果导致了泡沫 ,导致了市场的扭曲。我想先讲讲什么是不新的。

第一 ,所谓的“ 菲利普斯曲线不再有用 ”,这件事一点儿都不新。菲利普斯曲线只不过指的是一种经济状态 ,宏观经济还有很多状态。也许菲利普斯曲线是在很多时候发生的情况 ,在没有技术进步、没有新的发明的情况下 ,而不是在技术革命和制度革命的前提下的一种经常性的状态 ,它并不否认其他状态。不仅有高增长、低通胀 ,还有低增长、高通胀的时候 ,美国 20 世纪 70 年代、80 年代都有过 ,美国管它叫滞胀。它也违反了菲利普斯曲线 ,也引起了很多研究。无非那个时候是 negative supply shock ,而现在是 positive supply shock。过去是因为石油危机 ,石油成本、价格上涨而产生负效果 ,低

增长、高通胀,现在反过来,一个新的技术革命自然会带来新的 supply shock,使整个经济的平台提高,导致经济出现了一些特殊情况。这个一点儿都不新,要追溯到过去,历史上也出现过高增长、低通胀的状况,对不对?这不是什么新东西。

第二,有人说,为什么出现高增长、低通胀?就是因为现在有了新技术,人们可以有充分、完全的信息来准确地判断经济周期。大家都知道,从宏观经济学来讲,宏观经济的调整最终要通过存货投资这个变量来进行调整。有经济学家论证,现在我们有充分的信息了,因为信息的反馈很快,我们就可以严格控制存货,就不会发生经济衰退,就可以永远增长下去。现在结果证明,最大的存货出现在了最大的信息产业公司里面。谁呀?CISCO。到2001年3月底有60亿美元的存货。这时大家就开始提这个问题了,原来经济周期这个问题没有因信息技术而解决。信息的手段增多了,但还是需要判断信息的知识。信息的流动速度加快了,传递成本下降了,不等于信息的质量提高了。对不对?不等于你解决了你不知道的东西还是不知道这个问题。网络多了,信息方便了,但搜集信息的还是那么几个人,把它放到网上的还是那几个人,可能还少了,现在还抄来抄去了。(笑声)可能探索信息的人还少了,信息质量还更差了,而且人们观念上的判断偏颇仍然存在,知识的有限性。人们总是在进步的,信息技术总是在不断改进的,但是并没有解决这个基本的问题,因此并不能根本地消除和防止经济波动。经济学总是说信息越完全越好,但经济学并不需要用信息不完全来论证经济周期,经济学论证经济周期的论据第一是人的贪婪的本性,第二是人们预期的错误,这是人的社会特征,不可能靠信息技术进步来得到解决,所以我们还是会有经济周期,经济规律没有过时。

第三,这是比尔·盖茨说的,说从今以后世界是一个无摩擦的社会。意思是什么呢?信息都充分流动了,因此就没有摩擦了,包括没有周期,没有经济纠纷,没有利害冲突。这说对了一半,没说对另一半。信息这件事情,你可以解决已有信息传递速度加快和成本降低的问题,但你不能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刚才说了没有人去搜集信息,信息质量没有改变的问题,而摩擦冲突产生于什么?产生于信息的不对称,产生于人们故意地不给你信息,也就是掩藏信息;或者说假话、骗人,也就是故意给你假信息。天下的摩擦主要是因为骗人产生